

# 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

梅祖麟\*

## 一、導言

我先講個故事。

一九一九年我在耶魯大學研究院念哲學，那年李方桂先生來到新港 (New Haven)，晚飯後等漢恩 (Hans Frankel) 開車帶李先生到哈德福特 (Hartford) 去接公子培德，我也一起坐在車上。從新港到哈德福特差不多有一個小時的路程。那天晚上李先生興緻很好，打開話匣子，回憶他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的生活。每天晚上唸完書要喝杯咖啡才入睡。一面寫博士論文，一面自習藏文，不時到 Field Museum 去跟勞弗 (Berthold Laufer) 談談，接著李先生說：「一九二九回國以後，本來是不打算研究上古音的。後來看到章黃學派胡來，實在看不過。怎麼樣才開始研究上古音」。

大家都知道李方桂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在研究生時代，就立志要做漢藏語系的比較研究。那個時代相信漢藏語系有兩個支系，一個是台漢系，一個是藏緬系。侗台系有很多語言當時都沒有記錄，所以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學跟薩比爾 (Edward Sapir) 學習怎樣調查印第安語言，怎樣描寫印第安語言，以便以後回國後做非漢語的田野調查。同時又自習藏文，也是為了做漢藏比較。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李先生一九三一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上發表了〈切韻a的來源〉，一九三二年

---

\* 中央研究院院士

Handwritten notes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representing a dialect survey or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 and appear to be a mix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ossibly phonetic notations.

Handwritten notes in vertical columns, continuing the survey or transcription.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mix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ossibly phonetic notations.

圖一：李方桂先生調查民家話的手蹟（民國29年）

發表了〈中古東屋參沃的上古音〉。這都是李先生早期上古音的研究成果，李先生怎麼會從非漢語的研究轉到漢語音韻史的研究？答案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席話」：實在看不過章黃學派那種不科學的研究法。

我們現在是回憶三十九年以前李方桂先生的「席話」。一九五九年李先生是回憶三十年以前的事。三十九年加三十年是六十九年，差不多是七十年以前史語所成立的一九二八年。

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語所集刊》1(1929)）裡面點名批評了章炳麟，說他的《文始》是開倒車，他的《新方言》是「東西南北的猜去」。尤其重要的是〈工作之旨趣〉的最後一句：「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漢語音韻史是東方學的一部份。遇到了章黃學派不科學的研究法——《成均圖》、《文始》、「一聲之轉」——李先生覺得有責任去糾正，也就是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上古音。這正是新學術和舊學術交替的關鍵之處。

下面想說一下，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在語言學的領域裡，什麼是新的方法

和理論。我想有三項：(1) 描寫語言學，(2) 結構主義，(3) 比較研究，包括比較擬構。

這三項加起來把研究的重點從語文學 (philology) 移到語言學 (linguistics)。傳統的樸學小學是語文學，只顧書本上的資料。遇到活的語言和方言，一則不會描寫，二則不知道怎樣去利用。史語所帶頭的新語言學把活的漢語方言資料和文獻上的資料結合在一起運用，因此成就遠遠超過清儒，在國際上可以和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馬伯樂 (Henri Maspero) 並駕齊驅，章黃學派當然是望塵莫及，史語所帶頭的非漢語研究，一方面在藏文、西夏文、漢藏比較這幾個領域裡佔主導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侗台語的比較研究，李方桂先生不但是開山祖師，而且是集大成者。

最後，我想用兩個實例來討論一下七十年間史語所二組的工作中傳統和創新之間的關係。一個是段玉裁 (1735-1815) 的「同聲必同部」和漢藏比較。另一個是十九世紀德國少壯語言學家 (Junggrammatiker) 所說的「音韻演變規律沒有例外」和吳閩方言裡的時間層次。我想說明，史語所的前輩學者，把傳統的語文學和新進的語言學放在一起運用，大大地增進我們對《說文》和《切韻》的了解。

## 二、新語言學簡誌

### (一) 描寫語言學

一九二八年，史語所成立的那一年，趙元任先生發表了《現代吳語的研究》。這裡記音用的是國際音標，架構是準備做比較擬構的，此外還有精確但不容易懂的標調表。再過兩年，趙先生就發表他的五點標調法，“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1930)。同年，又發表 “Transcribing Reversed English”，《史語所集刊》2(1930)。倒說英語是趙先生的絕招，噤哩咕嚕說一串完全沒有意義的音節，用錄音機記錄，把錄音帶反方向（從頭到尾）播送，出來的是一段英語。趙先生一九七四年返康乃爾大學，參加畢業六十週年紀念，還表演了一次，據

說費力仍未老。這套工夫的第一步是轉寫倒看說的英語，從描寫語音學的觀點來看，是相當難的課題。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合著。這項工作一方面訓練年輕人，一方面做集體的田野調查。調查是一九三六年做的，書是一九四八年出的。丁聲樹、董同龢兩位後來在歷史語言學方面做出傳世的貢獻，年輕時代也參加了方言調查的行列。這是史語所二組的優良傳統，接觸邊活的語言，以後碰到古文獻裡的資料，就會特別注意方塊字後面的語言現象。

從《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 到《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音系的調查都是用趙元任《方言調查表格》(1930)。它的前身是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原著1915-26；中譯本1948)的《方言詞彙》，它的後身是北京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方言調查字表》(第一版1955；修訂本1964)。這種表格預先選定三千多個常用字，依《廣韻》的聲母、韻母、聲調排列，然後每個方言都調查這些字的語音。長處在短時間內可以了解一大片方言的音韻概況，短處是這些字不在自然說話的語境中出現，而且諸大方言的基本詞彙不盡相同，有些方言的口語根本不用預先選出來的「常用字」。固然早期的方言調查也附有用本方言說的「北風鑽太陽」、「狐假虎威」，但這兩個故事太短，要做篇章(discourse) 或語法方面的研究，總會嫌資料不夠。最重要的，幾乎每個方言都有「有音無字」的詞詞以及常用詞的俚俗音；這樣的詞彙和俚俗音在早期的方言調查中往往成為漏網之魚。

美國印第安語言沒有韻書，當然沒有《方言調查表格》。調查印第安語言，一貫的方法是請發音合作人說故事，背歌謠，把長篇的語料記下來再作分析。李方桂先生(1930, 1932a) 所描寫的 Mattole, Chipewyan 這兩種印第安語言，田野調查都是從記錄故事做起。抗戰時期，史語所遷到四川李莊，董同龢先生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史語所集刊》19[1948]) 就把記錄非漢語的方法用在漢語方言身上。這篇從記錄故事做起，在語料中分析出單字，再從單字中歸納出音系。

史語所遷台以後，董先生更是把這種田野調查的方法推廣，《鄉語研究》(1964) 當然是用這種方法，《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1959])：

729-1042) 在漢語方言學中是個里程碑。這篇文章描寫廈門、漳州龍溪、泉州晉江、潮州揭陽這四個地方的閩南語，特點是：(1) 每個方言完全從記錄故事做起，完全不用《方言調查表格》。(2) 開始閩語的比較研究，文中(比較音韻的材料)的小注中有精審的本字的考證。(3) 明確地指出閩南語中一字多音的現象已不是簡單的「說話音」(白讀)、「讀書音」(文讀)所能解釋。後來我們知道閩語有三個層次，這種觀念實在導源於這篇文章的1041頁。

這裡應該指出，歷史方言學的發展要靠描寫方言學的進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閩語一字兩音甚至三音的現象如果沒有語料記載，再聰明的歷史方言學家也不會發現閩語裡有三個時間層次。

## (二) 結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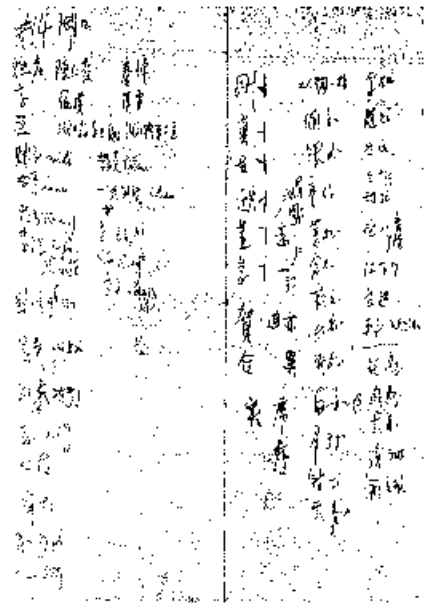
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學語言學的都讀過 Martin Joos 編的《語言學讀本》*Reading in Linguistics* (1957)。這本書收集了四十多篇講結構主義的文章，大多數原來發表在 *Language, W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等學報，在歐美地區以外發表的只有趙元任的“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史語所集刊》4(1934): 363-397。《讀本》選收了 Einar Haugen, “Directions in Modern Linguistics,” *Language* 27(1951): 211-222，是作者以會長的身份在美國語言學會的年會宣讀的文章，一開頭就說，結構主義是中國的趙元任先生、俄國的 Trubetzkoy 跟美國學者一起創立的。其他綜述美國結構主義的書，如 Dell Hymes and John Fought, *American Structuralism* (1975: 86, 128, 132) 也認為美國結構主義的創始人裡面有趙元任、李方桂。這就說明，結構主義不是在三十年代已在美國成型，然後輸入中國。相反地，趙元任、李方桂兩位在三四十年代同時在中國、美國兩地創立結構主義這種研究語言的方法。

趙元任先生的 *Mandarin Primer* (《國語入門》1948) 是本教科書，其中一章是北京口語語法的簡單描寫，描寫的方法兼顧分佈和功能，可以算是折衷派的結構主義。這章由李榮先生譯成中文，一九五三年在北京發行單行本《北京口語語法》，在中國大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丁聲樹、呂叔湘、李榮編著的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第一版，1961）語法體系基本上跟《北京口語語法》相同。朱德熙先生又發表了〈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1956年第1期；〈句法結構〉，《中國語文》1962年8-9月號；〈說「的」〉，《中國語文》1961年12月號。這幾篇後來都收入朱德熙《現代漢語語法研究》（1980），觀點都是結構主義。從引用書目來看，最有影響的是 Charles Hockett,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ord* 10(1954): 210-231; Zellig Harris,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51) 以及《北京口語語法》（1953）。

趙先生的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1968)，呂叔湘先生譯作《漢語口語語法》（1979），丁邦新先生譯作《中國話的文法》（1980）。這本書張琨先生（1982：387）譽為「結構主義的最佳代表作」（"structural linguistics at its best"），李榮先生說：「這部著作以直接成份分析法作為研究語法的主要方法，顯然受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可是作者持論通達，從來不拿事實遷就理論」。又接著說，「無論從立論的深度說，還是從影響的廣泛說，《中國話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漢語語法著作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 [1988]，頁514-515「趙元任」條下）。

結構主義的觀點可以用在語言史的研究。丁邦新先生的〈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史語所集刊》50(1979)：717-739，就是個特例。這篇文章說明中古漢語的音節結構是  $\{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 (S) V (\{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 ，C代表 consonant 輔音，S代表 semi-vowel 半元音，V代表 vowel 元音。上古漢語的音節是 (c) c (c) (s) vc。兩者結構不同，比方說上古有複聲母（\*sm-，\*skw-之類），有 -r- 介音，這都是中古沒有的。而且上古都是閉音節，中古卻有開音節。這些上古和中古的基本差別，用結構的觀點來看，一目了然，而且也容易解釋這些差別的來龍去



圖二：趙元任先生調查江西湖口方言的手蹟（民國24年）

脈。筆者也曾把結構主義的觀點用在語法史方面，請參看拙著，〈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史語所集刊》49(1978)：15-36。

高本漢擬構的中古音一發表，就有人嫌它元音太多，韻母太多。趙元任先生“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1941) 想用音位論的觀點把高氏的中古音簡化。做同樣工作的還有 Samuel Martin,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1953)。這兩篇文章可能都醫錯了病，第一，如周法高先生 (1954) 指出，這兩篇都沒有討論重要問題。第二，自然語言的音系會有一套平衡的機制；辨音的成份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高本漢的中古音是詮釋《切韻》裡的聲類和韻類。如果《切韻》所代表的根本不是一種自然語言的音系，而是南北兩種音系的合成品（請看比較研究第二節），音位這個觀念恐怕用不上。怪不得周法高先生 (1954) 在「後記」裡說，「關於馬丁氏的說法，董同龢先生表示對他們這一套『拿音標變戲』的辦法不感興趣」。

最成功地利用聲韻的分佈和結合來推論上古音，是雅洪托夫 Yakhontov 1960 年的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他指出來母不跟二等韻配合；《說文》只有三個來母的二等字「冷、菱、醜」。結論是二等韻在上古有 -r- 介音。雅氏的〈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1960) 也是用分佈的觀點來論證「古無合口」，但李方桂先生 (1984) 同樣用分佈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卻認為上古音有由 \*u- 組成的複合元音 \*ua。

語言學一直追求的是普世 (universal) 的方法和理論。科學的中國語言學所追求的也是普世的方法。趙元任先生的 “Non-uniqueness” (1934) 跟《北京口語語法》(1953) 說明結構主義不但如《語言學讀本》所說的，可以用在日語、德語、西班牙語、高麗語身上，同時也可以用在漢語身上。這就使我們相信結構主義可能是一種普世的方法。

### (三) 比較研究

西歐十九世紀興起的歷史語言學，基本信念是語音演變的規律性，也就是「語音演變沒有例外」。如果有例外一定是因為另外有一套規律。按照這條原則，有親屬關係的一系列語言或方言，它們之間共同詞彙的聲韻會有一對當

關係。比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尋求這種對當關係，以便建立這一系列語言的親屬樹 (family tree)，並擬測祖語 (proto-language) 的音系和詞彙。

比較研究在十九世紀的西歐有偉人的成就。格林、維爾納分別建立了格林定律 (Grimm's law)、維爾納定律 (Verner's law)。在這種定律的基礎上找出整個印歐語系的親屬樹。布魯格曼 (Karl Brugman) 發表了《比較印歐語法大綱》(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886-93])。對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方桂這幾位史語所的創始人來說，這就是科學的歷史語言學。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的前兩年，高本漢的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26) 四卷出版完畢，這本書有精確的描寫音韻學，二三十種漢語方言的比較詞彙，還有日本吳音漢音、高麗音、漢越語的音韻資料。

最重要的是高本漢首次把比較擬構的方法用在漢語音韻身上，得到輝煌的成果。以前只知道《切韻》音的聲母有若干類，韻母有若干類，現在高本漢拿漢語方言當作資料，用比較擬構的方法把聲母和韻母的音值都擬構出來了。這項研究震撼了整個歐洲的漢學界。對國人來說，更引起憂患意識。在二十年代，科學的漢語音韻史研究，正統不在中國，而是在瑞典或巴黎。怪不得在二十年代胡適、劉半農、趙元任幾位都想把高本漢的書譯成中文（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傅斯年序）。

史語所成立後，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三位先生，在傅斯年所長、胡適先生的支持下，前後化了五年工夫，把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譯成中文，並且加上精審的譯者注。翻譯工作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北極閣完成，出版卻是要等到一九四八年。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後，只懂中文的讀者才能在漢語音韻的資料裡看到比較方法的運用。

趙元任先生在《中國音韻學研究》只有法文本的時候已經看出來這本書的若干缺點。比方說，上海、溫州、福州、汕頭、廣州都是靠傳教士編的字典，是第二手資料。還有，按照比較擬構的一般程序，應該是先擬構共同吳語、共同粵語、共同閩語等等以後，再擬構它們的共同祖先，而不是像高本漢那樣大雜拌地把二三十個方言在一個層次中同時運用。趙元任先生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從書的架構看來，目的是得到吳語方言第一手資料，而且是準備



用比較方法來擬構共同吳語的。

此後在中國境內，比較研究首先在「非漢語」語言學中取得成果。李方桂先生的〈古台語中一套前帶喉塞音的假設〉(“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史語所集刊》11[1943]: 177-188)，看到現代台語方言反映都是濁聲母，但聲調的演變卻又像清聲母喉塞音 ?-，於是為古台語擬測了複聲母 ?b-、?d-、?j- 來解決這種衝突的現象。李先生的假設奠定了比較台語研究的基礎。隨後張琨先生的〈苗傜語聲調問題〉(《史語所集刊》16[1947]: 93-110) 又用比較方法說明古苗傜語有八個調類(其中有兩個入聲)，其中四個是陰調，四個是陽調。

比較研究在十九世紀的西歐興起，最早獲得的成果都是關於聲母(格林定律)，元音(英語的 Great Vowel Shift)，或是輕重音(維爾納定律)。東亞和東南亞的語言有聲調，最早把比較方法用在台語、越南語、漢語的聲調研究是馬伯樂(Henri Maspero 1911, 1912)。他認為台語和漢語的基本差別在於漢語聲母的清濁不同決定平上去入四聲中的陰陽兩調，而台語卻是由於高中低三種聲母決定諸方言中的三個調(registers)，而且古越南語的聲母也是三分制。李方桂先生〈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史語所集刊》34[1962]: 31-36) 推定古台語的聲母分成一清一濁兩類，把四個聲調演分為後來的八個調；李先生的兩分制修正了馬伯樂三分制。李方桂先生(1943, 1962) 對台語的研究，張琨先生(1947, 1966) 對苗傜語的研究，首次成功地把比較方法用在有聲調的語言身上，讓我們看到，在沒有早期文獻記載的情形下，還能擬測出來 ?b-、?d-、?j- 這樣的複聲母，還能夠找出來聲母影響聲調演變的規律。

一九七七年美國語言學會主辦的暑期語言學研討會請李方桂先生擔任 Herman Colitz Professorship。這個講座一向都是給印歐比較研究的學者，這次打破多年的傳統，把這個榮譽給了一位以研究漢藏語系和侗台語系為主的學者，而李先生會心地選擇了「喉音徵性與聲調演變」(“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al Development,” 《史語所集刊》51[1980]: 1-13) 為公開演講的題目。「喉音徵性」包括聲母的清濁，送氣還是不送氣，帶不帶前置喉塞音；最精彩的例證還是古台語中一套前帶喉塞音的複聲母。印歐語系研究的拿手戲是比較研究，Colitz 講座歷年來就是請印歐語的專家來展示比較方法最新的成果。李

先生的演講不啻在說，我已經把比較方法推廣到喉音徵性與聲調演變，更有資格承繼少壯語言學家 (Junggrammatiker) 發展出來的光榮傳統。

漢語和藏緬語的比較研究在二十年代末期已經開始，但有系統地進行卻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事。那時候有人想，藏文字典裡的詞彙是層層累積而形成，需要先川敦煌唐代藏文的資料篩選一番，古老的語詞才能用來跟上古漢語比較。緬甸文的詞彙也需要篩選。這種想法雖好，落實起來卻是工程浩大。

龔焯城先生〈漢、藏、緬語元音的比較研究〉（《史語所集刊》51[1980]：455-490）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用基本詞彙如數目字，人稱代詞「吾、汝」、身體部份「耳、乳、膝」，親屬稱呼「父、舅、孫、母」，鳥獸蟲魚名稱「鵝、馬、蝨、蜂、魚」作為資料，找出它們在藏文、緬文的同源詞，然後將四個元音的漢語上古音系統與五個元音的古藏語元音系統及龔先生分析古緬甸所得三個元音的系統加以比較，得出若干條漢藏緬元音對當關係的規律。兩個語言的比較，所謂同源詞還有偶合的機會。三個語言的比較把偶合的可能大大地減少。因此，這幾條三個語言的元音的對當規律，本身就有斷代、篩選的功能。附合這些規律的同源詞，屬於同一個時間層次，都是共同漢藏語傳下來的。

白保羅 (Paul Benedict 1972)，包擬古 (Nicholas Bodman 1980) 差不多同時發表了漢藏比較的著作，但他們沒有做龔先生所做的基本工作。看了他們著作中的「同源詞」，讀者不知道他們是按照什麼元音對當規律來決定，因此也不知道他們是在亂猜還是真正找到了同源詞。龔先生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Sino-Tibetan” (1995) 又添了西夏的資料，漢藏緬的比較中也添了新的同源詞，刪減了一些以前的所謂同源詞。這種工作之所以能夠積累，正是因為龔先生早就用比較方法，建立了堅實的元音對當規律的基礎。

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史語所的前輩學者就想做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史語所遷台後，機會終於來了。董同龢先生的〈四個閩南方言〉(1959) 比較廈門、漳州龍溪、泉州晉江和潮州揭陽等四個地方的閩南話，同時指出：(1) ‘先生’廈門是  $\text{ɕien}_2\text{ɕi}$ ，‘學生’是  $\text{hak}_2\text{ɕi}$ ，‘先後’的‘先’是  $\text{ɕi}$ ，‘學習’的‘學’的是  $\text{o?}_2$ 」。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口語，那麼‘先、生、學’的一字兩音是哪裡來的呢？只好假定閩南話的字在歷史上至少有兩個不同的來源。(2) 「有些切韻裡的韻，在其他方言難找出分別的痕跡的，在閩南語中倒可以看出

一些，如：魚—虞，哈—泰，支—脂，之」。（董同龢，1959：1041）。下面會看到，董先生這兩個觀察，後來都起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是在七八十年代形成方言中時間層次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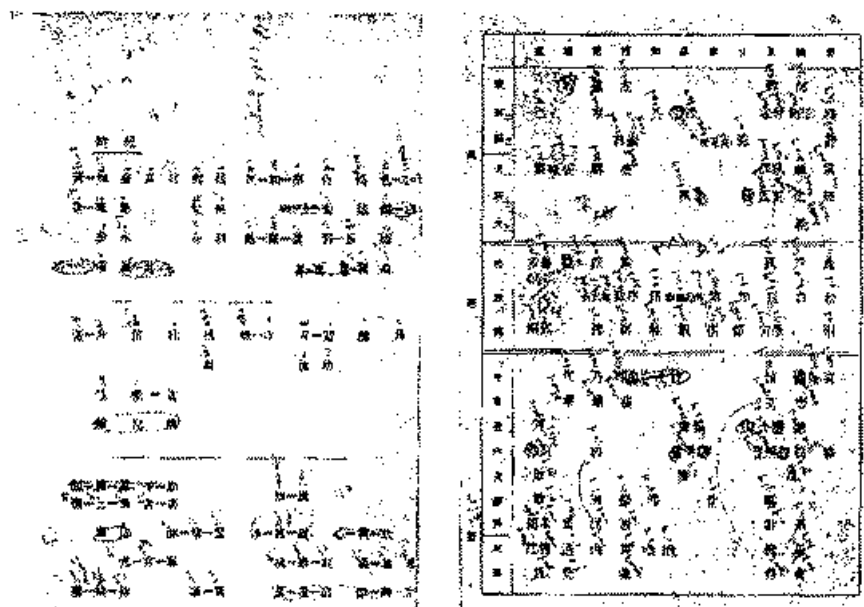
楊秀芳台大的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也是比較廈門、龍溪、晉江、揭陽這四個閩南方言，結論是閩南話有三個音韻層次。在這以前，羅杰瑞的博士論文(1969)繼續做閩語的比較研究，而且在所記錄的方言點中，不但有隆都、廈門、潮州、福州等東部閩語，還有建甌、建陽、邵武、浦城等四個西部閩語。羅杰瑞〈閩語詞匯的時間層次〉(1979)明確地指出閩語有三個時間層次。廈門話的「石」字有 *tsioʔ*、*siaʔ*、*sik* 三種語音，都是陽入調；「席」字也有三種語音。福州話的「懸」字也有三種語音。在這種情形下，同一個方言就可以看出來三個時間層次的存在。另一種情形要靠比較研究。比方說，董同龢先生已經指出，廈門話的「先」字有兩種語音。羅杰瑞先生指出，同韻的「天」字在廈門話裡也有 *thī*、*thien* 兩種語音；福州話只有一種，*thicŋ*。將樂話「天」字有 *thāi*、*thicŋ* 兩種語音；前者比廈門話的文白兩種語音都要早，來自共同閩語的 \**than*。這樣，比較廈門、福州、將樂三種閩語，可以說明「天」在閩語也屬於三個時間層次。更重要的，羅杰瑞先生把閩語三個時間層次的絕對年代分別訂在漢代、南朝、和晚唐。

第二、閩語的比較研究讓我們看到閩語跟「金陵切韻」的關係密切。

董同龢先生(1957：1041)已經指出，閩南語中可以看出來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哈泰有別。《切韻》序說：「又支脂魚虞，共爲不韻。……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顏之推(531-597)《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北人以庶爲成，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甲」。這幾句話告訴我們，當時方言有南北的差異。南指江南，也就是江東，其代表方言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鄉下，其實就等於洛陽（丁邦新 1995：415）。金陵《切韻》音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而這些韻類的差別，在閩語裡可以看出來痕跡。

《切韻》的八位編者劉臻、顏之推等都沒到過閩地，他們怎麼會知道閩地的語裡有魚虞之別，支與脂之之別？閩語裡的魚虞之別，支與脂之之別是怎麼來的？我們知道東晉南朝在江東地區流行的方言詞，如「儂（人），襖（袖），駝（腳），櫛（杓），漂（浮萍）」，現在還在閩語裡流行，而閩語口語中反而不用或少用「人、袖、腳、杓」等北方標準語中的語詞（羅杰瑞 1983；丁邦新，1988）。這就說明，南朝江東地區的人遷移到閩地，把這些江東地區的方言詞帶來。同一波的遷移，也把金陵《切韻》音帶到閩地，形成現代閩語中三個時間層次裡來自南朝的層次。

我們不禁要問：顏之推等所描寫的金陵音，是指太湖周圍吳越地區的方言。難道金陵切韻在現代吳語中完全看不到痕跡？張琨先生的《論吳語方言》（1985：221-222）首先用比較方法說明，武義、溫州、溫嶺、金華、寧波等浙江的吳方言，知章系聲母的幾個魚韻字顯示這些方言有個區別魚虞的層次，例字是「豬、煮、鼠、芋、箸」。李榮（1980）、張惠英（1980）也曾指出溫嶺、常熟、崇明等吳語，有些見系曉母的魚韻字如「鋸、處、渠（他）、許、魚」，韻母演變和本方言同類聲母的魚韻字不同，但沒有說明這是因為這些方言有個魚虞有別的層次。本文作者說明，蘇州、上海、嘉興、崇明、寧波、金



圖三：董同龢先生調查福建長汀方言的手蹟（民國42年）

華、武義、溫嶺、溫州——整個吳語——都有個魚虞有別的層次（梅祖麟 1994, 1995），而且我們知道像溫州這樣的浙江吳方言裡面，也能看到支與脂之有別的層次。至此真相大白，金陵《切韻》在吳語和閩語裡都留下痕跡。

### 三、傳統和創新

傅斯年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9) 說：「第一條是保持亭林（顧炎武），百詩（閻若璩）的遺訓，……亭林以語言按照時和地變遷的這一觀念看得頗清楚，百詩於文籍考訂上成那末一個偉大的模範著作……」。更早，胡適先生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1921) 也說：「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接著又盛讚錢大昕的「古無舌頭舌上之分」以及從顧炎武到章太炎的古音學。在「傳統和創新」的課題下，我們應該考察一下，史語所前輩學者所做的語言學的工作，有什麼成份是承繼清代樸學傳統的？

#### （一）「同聲必同部」與諧聲字研究

段玉裁 (1735-1815) 的「同聲必同部」是清代古音學家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它說，《說文》裡同一諧聲偏旁字一定屬於《詩經》押韻中的同一個韻部。有了段玉裁的學說，《詩經》韻和諧聲在上古韻母的研究中佔同等價值。更重要的是：以諧聲偏旁為綱領，古書裡不押韻的字也可以歸到《詩經》押韻的系統裡去了。

李方桂先生一九二九年回國，他討論上古音的第二篇文章 (1932b)，用的不是什麼歐美語言學最新的理論，而是「同聲必同部」。當江有誥贊成孔廣森東中分部的提議，而向王念孫引伸其說的時候，終不免幾個韻腳的糾纏，致使王氏不能信從，後來高本漢不採納那種分法，但是一到李方桂先生〈中古東屋冬沃的上古音〉(1936) 大量的參考諧聲字，以證其當分，高氏便翕然聽信了（董同龢 1948：68）。

另一個實例是王力先生在〈上古韻母系統研究〉(1937) 裡面提倡的「脂微

分部」，王先生把他的學說求證於《詩經》韻。結果，在全體108個韻例之中，可認為脂微分用者有82個，應視作脂微合用者仍有26處韻。因為合韻的情形到底是多，王先生只歸結到說，兩部的元音雖不同而相近，並不堅持一定要分部。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1948: 62-72)大量地參考諧聲字，說明「脂微分部說是值得而且必須採納的」。這樣，老師不能證明的學說給學生證明了。而且以後王力先生在《漢語史論文集》(1958)重印《上古韻母系統研究》，就把董先生《脂微分部問題》當作附錄。這是三四十年代上古音研究的一段佳話。

「同聲必同部」其實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段氏學說是說，諧聲字所反映韻母的音系屬於《詩經》時代。顧名思義，主諧字和被諧字總要音近才能諧聲，而音近總不見得只是韻母音近，聲母也該音近。聲母該怎麼樣音近？高本漢首先在《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裡的《諧聲字原則》說，諧聲偏旁相同的兩個字，它們上古聲母的發音部位必然相同。高氏的學說由趙元任先生譯成中文，就是《高本漢的諧聲說》，《國學論叢》1.2(1927): 23-65。

高本漢的諧聲說非常重要。清代古音學家主要是研究上古音的韻母系統，錢大昕固然也曾提出「古無輕唇音」，「舌無舌頭舌上之分」，但錢氏以及其他清代學者都沒有用諧聲字來研究上古聲母。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1849)全書以諧聲聲符為綱，按音分別歸屬於古韻十八部。同從一個諧聲偏旁的字都聯綴在一起，秩然有序。高本漢的《分析字典》(1923)《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1940)都是這種排列法。朱駿聲的書貫徹了段玉裁「同聲必同部」的主張，給後來研究諧聲字的學者添了很多方便，可惜朱氏還沒有悟出來諧聲字是成系統的研究上古聲母的好材料。高本漢的諧聲說提出後，問題已不是要不要用諧聲字來研究上古聲母，而是要怎樣用諧聲字來研究上古的聲母系統。

高本漢(1923)已經察覺他提出的諧聲字原則有若干例外，如「各、路」，「京、鯨、涼」，「監、藍」等見系聲母和來母互諧的現象，還有照三和見系聲母互諧的，如「支、妓」，「氏、祇」，「旨、耆」。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韻表稿》(1948)，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1971)把諧聲字中種種中古

聲母的配搭關係做了個總結。從形形色色的聲母的諧聲關係可知上古漢語有複聲母，但從甲骨文、金文方塊字的記錄還是弄不清楚上古漢語有哪幾種複聲母。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其中一部份可以利用漢藏比較的知識解決。

董同龢先生 (1948) 已經指出明微兩母和曉母諧聲的例，如「墨、黑；每、晦；微、徽；勿、忽」，還有審二（生母）和來母諧聲的例，如「吏、使；林、森」。雅洪托夫 (Yakhontov 1960) 認為，藏文有 s- 詞頭。漢語和藏語有親屬關係，上古漢語有該有 s- 詞頭，於是擬構了以下的同源詞：

墨 \*mak > mak      黑 \*smak > xak

比較藏文 smag      '黑暗'

林 \*rjam > ljam      森 \*srjam > sjam

吏 \*rjag > li      使 \*srjag > ši

此外羅氏指出，來母幾乎沒有二等韻的字，而且跟來母諧聲的絕大多數是二等字，如「彘、釗；緜、蠻；卑、埋；來、麥；麗、灑；闕、束；濫、監；隆、降；留、卯」。因此他認為二等韻在上古有 -r- 介音。羅氏的說法可以在漢藏比較得到印證（龔燦城，1995）：

上古漢語		藏文
𠄎，𠄎	*mrang	sbrang < *smrang '鱗'
梗	*krang	khrang '堅硬'    krang '繫'
行	*grang	krang-oge '站立'
甲	*krap	khraβ '鱗甲，盾'

## （二）《切韻的性質》

高本漢的中古音雖然是詮釋《切韻》的音系，但《切韻》到底是反映哪個時代的哪種方音，這個問題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沒有弄清楚。四五十年代最流行的說法認為陸法言《切韻》代表西元七世紀初的長安方音。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1920: 11) 就說：「現存最早關於長安方言的文獻是陸法言《切韻》(602)」。高本漢在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1954: 212) 也說：「中古漢語是指《切韻》所規劃的公元六〇〇年的語言，

基本上是陝西長安的方言。在唐代它成爲全國各大城市裡文士的標準語。」在小注裡又說「幾乎所有的現代方言（除了福建以及臨近地區的閩語以外）都導源於這個《切韻》音所形成的標準語」。

陳寅恪先生的〈從史實論切韻〉(1948)徹底地批評了《切韻》代表唐代長安方言之說。他指出(1)按《切韻》序，陸法言論《切韻》是根據開皇初劉臻、顏之推等八人論難的決定。這八個人裡面，劉臻、顏之推、蕭該是南人，幼年住在金陵；其他五位是北人，四位生長在鄴城，另一位盧思道十五歲時到鄴下。這八位中沒有一位世居關中，而他們都是中年以後才到長安的。(2)陸法言論撰《切韻》所用的主要材料，完全沒有關中人士的著作。因此(甲)《切韻》不可能代表七世紀的長安方言，(3)也不可能代表「當時某一地行用之方言」。

周祖謨先生〈論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1966)用了南北朝詩人的押韻，《切韻》以前的韻書、顧野王(519-581)《玉篇》的反切、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等資料，說明《切韻》是折衷南北的一本韻書，其中有兩種音系，一種代表北方的鄴下方言，一種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最重要的是周先生具體地說明了這兩個音系的內容。比方說，金陵方言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洽狎有別，脂之相混，從邪相混，乘禪相混。鄴下方言即洛陽方言，其中魚與虞、支與脂、洽與狎多不分，但脂與之有別，從邪、乘禪有別。

以前高本漢認爲《切韻》代表唐代長安方言，也就是全國的標準語。在這種「大一統」的架構下，高氏又認爲幾乎所有的現代方言都導源於唐代的標準語，也就是他擬構的中古音。現在我們知道《切韻》中有金陵、鄴下兩個音系，現代諸大方言的來源也需要重新考慮。

丁邦新先生(1995:417)說，現代大部份方言可以分爲兩組，官話是從鄴下切韻的系統演變而來；客家話、南贛方言、粵語和鄴下切韻有關，今後擬測鄴下切韻要以這幾個方言爲資料。本文作者在第二段第三節末段嘗試說明閩語、吳語各有一個導源金陵切韻的層次，我們猜想贛北方言也有。閩、吳、贛北導源於金陵切韻的時間層次，當然是今後擬金陵切韻的主要資料。



#### 四、結語

在短短的篇幅中綜述史語所二組七十年來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比方說，實驗語音學、漢語語法史、南島語研究長期以來是本所的研究重點，本文沒有提到。其他遺漏之處在所不免。這七十年裡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其中有不少可圈可點的教訓。下面簡單地說幾句。

第一、史語所帶頭的新語言學，裡面有傳統樸學的成份。

描寫語言學、結構主義、比較研究，這三種觀念和方法，是新語言學的特徵，於是不免有人會覺得史語所是個洋味十足的機構。其實不然。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是介乎文字學和古音學的學說，也是兼跨《說文》學和《詩經》學的學說。這是清代樸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上面看到李方桂 (1932b)、董同龢 (1948) 還是用「同聲必同部」來研究東中分部、脂微分部。陳寅恪先生的〈從史實論切韻〉(1948) 所做的工作，跟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一樣，是文籍考訂。周祖謨先生〈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用的也是樸學的方法；找出《玉篇》音系用的是陳澧 (1810-1882) 發明的反切係聯；分析南北朝文士的詩文押韻用的就是清代古音學家研究《詩經》韻部的方法。

新語言學相信「音韻演變規律性」。章黃學派相信「一聲之轉」。李方桂先生一九二九年回國後看到章黃學派胡來，就是《成均圖》裡的轉來轉去，無所不轉。不過應該注意清代從顧炎武到江有誥的古音學家，他們追求的就是《詩經》押韻的規律性，《詩經》押韻有一種規律，諧聲也有一種規律，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說這兩種規律其實是一種規律。由此可見追求音韻演變的規律性並不是十九世紀德國少壯語言學派的專利。不同之點在於清代樸學家如王念孫、朱駿聲一方面相信《詩經》押韻的規律性，一方面又相信「一聲之轉」。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年的章黃學派。跟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堅決地劃清界限，這才是新語言學的精神。

第二、歷史和語言這兩門學科是相輔相成的。

古語言學家如高本漢、馬伯樂、趙元任、羅常培研究《切韻》聲母韻母的

音質，研究了幾十年，還沒弄清楚《切韻》的性質。史學家陳寅恪和語文學家周祖謨卻闡明了《切韻》的性質以及這部韻書南北兩系的方音基礎。同時也說明，在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下，金陵和鄴下（洛陽）這兩個江東河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對它們所屬的地區在語言文化方面有決定性的影響。

反過來，語言學對歷史學也有所貢獻。漢藏比較說明漢族和藏緬族有親屬關係，西夏語是藏緬語的一支，這都是民族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上面所說的閩語中的三個時間層次，包含著閩地的移民史。丁邦新先生（1995）和我都認為現代方言可以分成兩組，一組導源於金陵切韻，另一組導源於鄴下切韻。這種想法是變相的南北朝到唐宋這段時期的漢民族遷移史。

第三，有了方法和理論，才能把原料變成研究資料。語言學的方法理論不需要太多。三五個正確的就夠用了。

揚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已經知道漢語有方言，但如果沒有描寫語言學，如果沒有十九世紀歐洲創立的歷史語言學，我們還是不會描寫記錄方言，不知道怎樣去利用漢語方言這宗可貴的資料。許慎（58?-147?）已知諧聲是六書中的一種，但有系統地去研究諧聲字的韻部導源於段玉裁，有系統地去研究諧聲字的聲母是高本漢（1923）開始的，由董同龢、李方桂兩位發揚光大。這項研究到現在有六十五年了，它的最後歸宿一方面是漢藏比較，另一方面，甲骨文、金文裡還有同類的音韻資料，可以用研究諧聲字的方法去研究。

格林定律是一八二二年，姑且把那年當作比較方法的開始，至今已有一個半世紀的壽命。傳入中土後，它在比較台語中建立了聲母和聲調演變關係的規律，在漢藏比較中間接地給藏文緬文的詞彙斷代，在漢語方言學中引入時間層次的觀念。這個觀念修正了親屬樹的看法，因為親屬樹的每個分支一般假設只有一個層次，而我們知道吳語和閩語都不止一個時間層次。比較方法可以用在漢語身上，也可以用在非漢語身上，而且像漢藏比較的領域更是非要同時用在漢語和非漢語身上不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比較方法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戲法，變化多端，妙用無窮。

最後，我想用一聯詩來描寫新歷史語言學在中國的歷程：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一九二八年就開始研究《切韻》，就調查漢語方言。

到了五十年代，積累的各處的方言調查已經不少，但不知用什麼樣的線把散錢串起來。董同龢、羅杰瑞、楊秀芳的比較閩語研究帶來了時間層次的觀念，張琨先生和本文作者再把時間層次的觀念用在吳語身上。轉了一個圈，發現吳語和閩語都跟金陵切韻有關。一九二八年上古音的研究剛開始，高本漢的諧聲說帶來一宗成系統的新材料，但《上古音韻表稿》(1944, 1948)發表後，又有山窮水盡的感覺。漢語本身中有關上古音韻的資料用盡了，上古聲母的擬構仍在背黃不接的階段。那時雅洪托夫異軍突起，從漢藏比較的觀點給上古音研究打出了一條新路。

換句話說，七十年以前史語所的幾位創始人——傅斯年、趙元任、陳寅恪、李方桂——怎麼樣都不能預料漢語史研究在中國的具體發展。他們只是憑著一種信念，相信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境內的語言，總會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他們創辦史語所的旨趣不但實現了，而且有些成就在國際語言學界是領先的。這是值得使我們自傲的，也應該讓我們飲水思源。

## 引用書目

### 丁邦新

- 1974 〈「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文復月刊》7.8；收入幼獅月刊社編，《中國語言學論集》，1977，頁453-470。
- 1979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4(1979)：717-739。
-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988)：13-22。
-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1995.5：414-419。

### 丁樹聲、呂叔湘、李榮編著

- 1961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

###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

- 196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特刊》。

### 中國科學語言研究所編輯

- 1964 《方言調查字表》，1955，第一版（修訂本）。

### 王力

- 1937 〈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清華學報》12：433-540。
- 1958 《漢語史論文集》。

### 朱德熙

- 1956 〈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1：83-112。
- 1957 〈說「的」〉，《中國語文》12月號：1-15。
- 1962 〈句法結構〉，《中國語文》1962.8/9：351-360。
- 1980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 朱駿聲

- 1849 《說文通訓定聲》。

李方桂

- 1930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 1931 〈切韻 a 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38。
- 1932a 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7: 122-151.
- 1932b "Ancient Chinese -ung, -uk, -uong, -uok, etc. in Archaic Chinese," 〈中古東屋冬沃的上古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375-414。
- 1943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77-188。
- 1962 〈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31-36。
- 1970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
-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 1980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al Development,"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1-13。
- 1984 〈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1：1-7。

李榮

- 1980 〈吳語本字舉例〉，《方言》，頁137-140。
- 1988 〈趙元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514-515。

周法高

- 1954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5：1-19。

周祖謨

- 1966 〈問學集〉，270-404頁是〈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434-473頁是〈切韻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周先生跟董同龢先生同一年（1936-37）進歷史語言研究所）。

胡適

- 1921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收入《胡適文存》一，頁383-412。

徐櫻（李方柱夫人）

1984 〈金婚〉。

陳寅恪

1948 〈從史實論切韻〉，《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單行本，又載《嶺南學報》9.2(1949)：1-18。

張琨

1947 〈苗僛語聲調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93-110。

1953 On the Tone System of the Miao-Yao Languages. *Language* 29: 374-378.

1982 Y. R. Chao in Memoriam.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2: 386-388.

1985 〈論吳語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2：215-260。

張惠英

1980 〈吳語札記〉，《中國語文》1980：420-426。

梅祖麟

1978 〈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15-36。

1994 More on the Aspect Marker *ts* in Wu Dialects. In Chen, Mathew and Ovid Tzeng ed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pp. 323-332.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頁1-12。

傅斯年

1928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0。

董同龢

1948 〈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11-249。（此文又曾發行單行本，史語所單刊甲種之21，1944）。

1948a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1-201。

1959 〈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1964 〈鄒語研究〉。

楊秀芳

-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步偉（趙元任夫人）

- 1972 〈雜記趙家〉。

趙元任

-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
- 1930a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itre phonetique* 45: 24-27.
- 1930b "Transcribing Reversed English."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 205-223。
- 1930c 〈方言調查表格〉。
- 194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203-223.
- 1948a (與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合著)，《湖北方言調查報告》。
- 1948b *Mandarin Primer* (《國語入門》)。
- 1953 (李榮譯)，《北京口語語法》(原文是《國語入門》導言裡的第三章「語法」)。
-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呂叔湘譯《漢語口語語法》，1979；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1980)。
- 1977 *Yuen Ren Chan. Chinese Linguist, Phonologist, Composer and Author.*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Rosemary Leve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y Haas. Berkeley, California: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蘇煒城

- 1980 〈漢、藏、緬語元音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 455-490。
-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 in Proto-Sino-Tibetan. In Wang, William S-Y. 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nedict, Paul (白保羅)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Bodman, Nicholas (包擬吉)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van Coetsem, Frans and Linda Waugh ed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34-199.

Brugman, Karl

1886-93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

Chan, Ning-ping (陳寧萍)

1988 *Fang-kuei Li. 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 an oral history conducted 1986 by Ning-ping Chan and Randy LaPolla,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arris, Zellig

1951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Haugen, Einar

1951 Directions in Modern Linguistics. *Language* 27: 211-222.

Hockett, Charles

1954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ord* 10: 210-231.

Hymes, Dell and John Fought

1975 *American Structuralism*.

Joos, Martin ed.

1957 *Reading in Linguistics*.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15-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26) (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譯，〈中國音韻研究〉[1948])。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趙元任譯，〈高本漢的諧聲說〉，〈國學論叢〉1.2(1927): 23-65 是翻譯這本書



的第三節 “Th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1940 *Grammata Serica*.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Martin, Samuel

1953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Supplement to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6: 1-46.

Maspero, Henri (馬伯樂)

1911 Contributions a L'etude du Systeme Phonetique des Langues Thai. *Bulletin de l' 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Orient* 11: 153-169.

1912 Etudes sur Phonét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EFEO* 12.1: 1-127.

1920 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 1-124.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 頁268-274。  
(梅祖麟譯, 〈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大陸雜誌》88.2[1994])。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 頁202-211。

Yakhontov, S. E.

1960a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at the 25<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中譯文〈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 收入《漢語史論集》, 頁42-52)。

1960b Fonctika Kitaiskago yazyka I tsysacheletiya do n. c. (labializovannyec glasnyye). *Problemy Vostokovedeniya* 6: 102-115. (中譯文〈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 收入《漢語史論集》, 頁53-77。)

1986 (〔蘇〕謝、葉、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